

遣使会与塞外三个传教中心的形成

宝贵贞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100081 北京)

提要:遣使会(Congregation of the Mission, C. M.)是入华传教的天主教四大修会之一。它上承耶稣会,下启圣母圣心会,向蒙古人开教,开创了蒙古地区三个传教中心,为后来蒙古三大教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天主教、遣使会、礼仪之争、传教中心

作者:宝贵贞,女,蒙古族,内蒙古奈曼旗人,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民族哲学、民族宗教的教学和研究。中关村南大街27号,10081 北京海淀区,中国,电话:+86-136-9362-8575。电子邮件:qqg1231@163.com

18世纪以后,随着西方传教目标向塞外转移,有许多西方教会——耶稣会、遣使会、圣母圣心会等活跃于内蒙古广大地区。其中遣使会(Congregation of the Mission, C. M.)是入华的天主教四大修会(耶稣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和遣使会)之一,也是当时在中国最重要的一个传教修会。该会于1625年在巴黎成立,其宗旨是向乡间贫苦民众们派遣布道使者、在贫穷和偏僻地区创建修院以培

养原住民中的青年神职人员,积极从事慈善事业,故而被称为“遣使会”。由于该修会的第一座修院创建于巴黎的圣-辣匝禄(Saint-lazare),所以也被称为“辣匝禄会”;由于遣使会的创始人是法国人味增爵(Saint Vincent de Paul, 1581-1660年),故而也被称为“味增爵会”。该修会于1632年经教皇乌尔班八世(Urban V III, 1623-1644年任教皇)批准,正式跃居天主教的重要修会之列。遣使会于1785至1865年间负责江浙、直隶、蒙古等地教务,在中国传教达80年之久,它上承耶稣会,下启圣母圣心会,为基督教在塞外拓展贡献卓著。学界对遣使会在塞外基督教传播的研究尚不多见,史志资料亦很零散,本文以清代天主教传教中心转移为背景,探讨遣使会与内蒙古三大教区的形成历史,为进一步研究天主教塞外传播及中西文化交流提供研究视角。

一、礼仪之争与传教中心转移

早在16世纪中叶,随着天主教势力在东南亚地区的不断扩大,罗马教廷就确定了在东亚传教的总体战略,即:要使东亚国家皈依天主教,首先得使中国皈依天主教。1576年,澳门教区成立,负责统辖中国和日本的传教事宜,至此,西方教会终于有了在中国传教的桥头堡。由于澳门沦为葡萄牙殖民地,此后,中国的传教活动一度由葡萄牙支持的耶稣会控制。

17世纪中叶,西班牙支持的多明我会、方济各会,法国支持的外方传教会、遣使会相继进入中国。由于当时的传教士大多不懂中文,又不了解中国国情,而为了争夺传教权及势力范围,他们对耶稣会的一些宽容措施提出了非难,西班牙籍多明我会教士马拉来斯于1643年写出17条指控向教皇汇报,

其结果是,1645年教廷发布禁令,要求中国教徒严格遵守天主教戒律。从而挑起了康熙年间的“中国礼仪之争”。后来争议进一步升级,教皇克莱孟十一世作出了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的决定,1715年,教皇颁布“自即日起”通谕,正式禁绝中国礼仪。1720年,教皇派特使来京重申禁令,此举无异于宣布中国天主教徒必须放弃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康熙帝愤然批示:“以后,不必西洋人来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陈垣(辑录)《康熙与罗马教皇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卷十四)这次禁教使基督教传教事业受到了严重挫折。

至雍正时期,基督教仍然禁而不绝,雍正帝于1724年下诏禁止西方传教士公开传教,禁教一度更加严厉,天主教士被迫转入半地下状态并向京城周边转移。然而,宗教现象并不是行政命令或暴力手段所能消灭的,出于传教需要及几分无奈,天主教传教中心随着传教士的足迹逐渐转向塞外,这也客观上扩大了天主教传播范围,使天主教在华传教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

1783年,法国路易十四国王要求教廷传信部准许由法国遣使会士们取代耶稣会士们主持北京传教区,1785年遣使会正式接管法国耶稣会在京教务。之后他们大举进入中国,当时来华的遣使会会士主要是法国人,他们奉命接管耶稣会在华传教区及其财产(教堂、设施、墓地),特别是接收了天主教在华的最大中西文文献中心北堂图书馆。在塞外,遣使会士在耶稣会确立的传教基础上,经过秦噶啐(Joseph Gabet, C. M. 1808-1853年)神父、孟振生(Mgr. Joseph-Martial Mouly, C. M. 1807—1868年)主教、孔主教(Fr. Florent Daguin C. M., 又译为达京)的努力经营,在内蒙古的传教范围进一步拓展,他们学习蒙古语、熟悉蒙古习俗,尽量接近行教之地的经济、文化和习俗,传教活动一度顺利。遣使会士以西湾子为中心,逐渐向内蒙古东西两个方向建堂传教,逐渐形成了以苦立图教堂为代表的东部传教中心和以小东沟为代表的西部传教中心,遣使会由此得以良性发展。

二、向蒙古人开教

遣使会教士到达西湾子后,很快就向东发展到当时的热河境内,传教士此时最大的功绩是劝导蒙古人甚至喇嘛转信天主教。正如遣使会成立时所确立的宗旨:向乡间贫苦民众们派遣布道使者、在贫穷和偏僻地区创建修院以培养原住民中的青年神职人员。孟振生主教也说:“开教的弘愿,就是要劝化西湾子北边的

蒙古居民”^{〔1〕} 秦噶啐神父正是实现孟振生“弘愿”的坚定实践者。

法国遣使会士秦噶啐神父(Joseph Gabet, C. M. 1808-1853年),1833年10月晋铎,1834年3月加入遣使会。1835年8月到达澳门。秦噶啐神父1836年8月出发前往蒙古教区,1837年(道光十七年)3月到任。到达西湾子秦噶啐神父即开始学习中文,不久被孟振生派往兴和县大青山东沟村送终傅。秦噶啐神父利用此行,对蒙古地区进行了考察,后又多次去蒙古其他地区游历,了解蒙古民风人情,试图发展蒙古人入教。

秦噶啐神父在黑水和热河布道多年,其间他在关东学会了蒙古语、满语,成功归化了3名蒙古喇嘛,即保禄、凤喇嘛和桑达钦巴。秦噶啐神父在承德的一个小村传教时,了解到附近村民与西湾子教徒有往来,想请人为他找几个儿童来教他学蒙语。不久,教徒们请来了两个年轻的蒙古喇嘛,并开始教秦噶啐神父学习蒙古语。其中一位喇嘛11岁入镶黄旗卓资喇嘛寺,通晓蒙满汉藏语言文字,在喇嘛寺学习14年后于25岁时(1837)离开喇嘛寺,到达西湾子。秦噶啐神父选定一本要理教材来学习

〔1〕 [比利时]隆德里 Longdeli [Valeer Rondelez, 1904-1983]:“西湾子圣教源流 Xiwanzi shengjiao yuanliu”,载古伟瀛 GU Weiyong 主编:《塞外传教史》*Saiwai chuanjiaoshi* [History of mission beyond the Great Wall],(台北 Taipei:台北光启文化事业出版社 Taipei Guangqi wenhua shiye chubanshe, 2002年),第25页。

蒙语口语和文字。不久之后,这位喇嘛因受教理影响而改变固有观念,反倒成了秦噶哗神父的徒弟,于1837年9月25日,做了“望教友”,圣名“保禄”(Paul)。这位喇嘛成了秦噶哗神父劝化的第一位进教的蒙古人,为此西湾子还举行了一场弥撒。次年,保禄正式受洗,成了秦噶哗神父的传教助手。

1838年,又有一位凤姓喇嘛在西湾子改奉天主教,成了第一位晋铎的蒙古族神父。教士们到东部苦立图开教时,有凤姓蒙古人,本信奉藏传佛教,欲前往五台山许愿,路过此地,受教士感化而转信天主教,最后晋铎为神父,圣名伯多禄。凤喇嘛又译作冯喇嘛,后曾入遣使会。凤伯多禄归教后,心定志坚,后被派到澳门大修道院进修学习,毕业后返回西湾子,于1854年晋铎,开始在蒙古地区传教。除了保禄、凤喇嘛两个蒙古喇嘛入教外,还有一个“蒙古喇嘛”——桑达钦巴,也被劝化奉教,他后来成了古伯察和秦噶哗神父游历蒙古和西藏的向导。

蒙古喇嘛受洗进教,进一步刺激了传教士的兴奋神经,“神父们更确定对蒙古民族传教的方针了”。〔2〕他们想从年轻的蒙古喇嘛入手,培养喇嘛修道晋铎,再利用他们在蒙古人中发展教徒。孟振生还曾决定在西湾子创办一所大公学院,学习中文、蒙文、满文、藏文,并设法招收蒙古儿童,以培养蒙古传教士。但此设想当时并未实现。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另一位法国遣使会士古伯察(Regis-Evariste Huc,1813—1860)到达西湾子。这位被称为“西来的喇嘛”的古伯察通晓多种语言文字。1836年他在巴黎加入遣使会,1839年晋铎。据记载,古伯察“心怀劝化蒙藏人民信教的大志,所以学习蒙古话”。孟振生曾对古伯察、秦噶哗神父的语言才能颇为赞赏:“秦神父和古伯察是两位颇有满文和蒙文修养的人,相当多地掌握了藏文以更有效地向当地有学问的喇嘛们行使圣职。”〔3〕古伯察到达后不久即前往关东与秦噶哗神父相会,并商议游历事宜。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9月10日,古伯察神父、秦噶哗神父开始横穿中国之旅。三人从内蒙古东部喇咧沟的马架子出发,经翁牛特旗、克什克腾旗、察哈尔、西土默特旗、库库浩特、察罕库伦、鄂尔多斯、宁夏、甘肃、青海等地,旅途长达18个月,于1846年1月29日到达西藏拉萨。

古伯察和秦噶哗神父游历的主要目的是传播天主教。“该夷人虽远涉重洋,经历数省,实止冀图传教”,〔4〕特别是在蒙古和藏族地区传教,“使蒙古人福音化完全是秦神父和古伯察这次旅行的目的”。〔5〕孟振生也曾命令他们:“你们一定要逐帐篷、逐部族、逐喇嘛庙地前进,一直达到上帝的天意使你们知道它想让你们停下来开始自己事业的地方为止”。〔6〕古伯察本人也承认这次旅行的目的是研究鞑靼人的特征和风俗习惯;如果可能的话,也要研究宗座代牧区的范围和区限。后来在蒙古教区传教的常非神父和王学明主教也认为:“在内蒙传教之胡克与额贝(即古伯察与秦噶哗——引者注)……二位司铎之计划,乃在劝化佛教之

〔2〕 Ibid.

〔3〕 《遣使会年鉴》*Qianshuihui nianjian* [Yearbook of Congregation of the Mission],第11卷,1846年,第444-445页,见[法]古伯察 Gubocha [Évariste Régis Huc] 著、耿昇 GENG Sheng 译:《鞑靼西藏旅行记》*Dadan Xizang lüxingji* [Record of Tartar in Tibet],(北京 Beijing:中国藏学出版社 Zhongguo zangxue chubanshe [China Tibetan Studies Press],1991年),附录第32页。

〔4〕 《筹办夷务始末》*Chouban yiwu shimo*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about establishing Foreign Affairs]卷七七(道光 Daoguang 卷七七年),耆英 Shi Ying 等奏讯明至藏传教之佛喇嘛夷人酌办情形摺(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十月戊辰,1846年12月4日),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Shanghai Classic Press],2003年)。

〔5〕 [法]古伯察 Gubocha [Évariste Régis Huc] 著、耿昇译:《鞑靼西藏旅行记》*Dadan Xizang lüxingji* [Record of Tartar in Tibet],(北京 Beijing:中国藏学出版社 Zhongguo zangxue chubanshe [China Tibetan Studies Press] 1991年),第33~34页附录。

〔6〕 [法]包世杰:“《鞑靼西藏旅行记》新版本序言 *Dadan Xizang lüxingji xinbanben xuyan*” [Preface to the new version of Record of Tartar in Tibet],见[法]古伯察 Gubocha [Évariste Régis Huc] 著、耿昇译:《鞑靼西藏旅行记》*Dadan Xizang lüxingji* [Record of Tartar in Tibet],(北京 Beijing:中国藏学出版社 Zhongguo zangxue chubanshe [China Tibetan Studies Press],1991年),第11页。

中心人物皈依圣教,以求蒙古人望风景从之奇效。”〔7〕

传教士向蒙古人开教,标志着传教区域向蒙古腹地延伸,这不仅是蒙古人信仰皈依的问题,也是两种信仰、两种文化在近代大背景下的相遇、碰撞、交流和对话的过程。尽管由于语言文化、信仰习俗、经济生活等方面的原因,蒙古族信徒人数不多,然而,遣使会向蒙古地区及蒙古人传教本身,加速了基督宗教的中国本土化过程。

三、开创三个传教中心

西湾子(清代察哈尔盟之西湾子,今属河北省崇礼县),是清代天主教在内蒙古传教最早的地方。借用教会的一部著作《西湾子圣教源流》〔8〕的名字,可以说,西湾子是“圣教”在蒙古地区传播流布之“源”,而蒙古其他地区的天主教则是西湾子源头之“流”。遣使会法国会士来北京前,由耶稣会经营的塞外西湾子教务已初具规模。此时之蒙古西湾子,因“圣教犯禁”,教士、教徒多往避难,信众人数随之剧增。

1785年,接受罗马教廷谕令的法国遣使会神父来到北京,接替了耶稣会传教士的传教使命。首批到达的遣使会士有罗广祥(Nicolas-Joseph Raux, C. M., 又作罗旒阁)、古[吉]德明(Jean-Joseph Ghislain, C. M., 又作冀若望)和巴茂正(Paris, 又作巴保禄)修士等。〔9〕遣使会在北京北堂(即张诚所建之北堂)设有修道院,罗广祥、吉德明、南弥德神父(Louis-Francois-Marie Lamiot, C. M. 又译作拉米奥神父〔10〕),先后担任会长和院长。

遣使会北京教区继续派神父到西湾子巡教。当时之西湾子,属北京教区宗座驻地,为“全中国北方的总堂”。遣使会在蒙古地区的活动,以西湾子为中心,向东西两方发展,取得了一定效果,使西湾子作为蒙古地区传教中心的地位日益巩固。延续西湾子传教中心的主要是中国籍神父薛玛竇、孟振生主教、孔神父、秦噶咩神父、蒙古风神父等。

道光初年,作为北京北堂修道院院长的南弥德神父被驱逐到澳门,于是,“一名中国遣使会士薛某人受托以法国传教区会长的身份负责已存在的事业”,〔11〕这位薛某人就是中国籍神父薛玛竇(1780—1860)。薛玛竇神父出生于江西薛氏教友家庭,幼时受洗,圣名玛竇,年轻时入北京北堂遣使会修院,

〔7〕 王学明 WANG Xueming:“天主教在内蒙古地区传教简史 Tianzhujiao zai Neimenggu diqu chuanjiao jianshi” [A brief history of Roman Catholic Mission in Inner Mongolia Region] 摘录常非 CHANG Fei《天主教绥远教区传教史》Tianzhujiao Suiyuan jiaoku chuanjiao shi [A history of Roman Catholic mission in Suiyuan diocese] 部分内容,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内蒙古文史资料》Neimenggu wenshi ziliao [Inner Mongolian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第二十二集,1987年,第137页。

〔8〕 “西湾子圣教源流”,比利时圣母圣心会神父隆德里 Longdeli [Valeer Rondelez, 1904-1983] 著,原本作《西湾圣教源流》Xiwan shengjiao yuanliu [The Origion of the Holy Church], 张树榛 ZHANG Shuzhen 译,北平西什库天主教遣使会印字馆 Beiping Xishiku Tianzhujiao Qianshihui yinziguan 民国二十八年(1939)出版。后经古伟瀛 GU Weiyang 加以润饰,并恢复本名,集入其所编之《塞外传教史》Saiwai chuanjiaoshi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beyond the Great Wall], (台北 Taipei: 台北光启文化事业出版社, Taipei Guangqi wenhua shiye chubanshe, 2002年)。

〔9〕 樊国樑 FAN Guoliang:《燕京开教略》Yanjing kaijiao lue 云首批来京三人为罗旒阁 LUO Nige、冀若望 JI Ruowang、巴保禄 BA Baolu(未标注拉丁文),古伯察 GU Bocha《鞑靼西藏旅行记》Dadan Xizang luxing ji(汉译本)附录云三人为罗广祥 LUO Guangxiang、古德明 GU Deming、巴茂正 BA Maozheng、罗旒阁 LUO Nige 即罗广祥 LUO Guangxiang,巴保禄 BA Baolu 即巴茂正 BA Maozheng,冀若望 JI Ruowang 即古德明 GU Deming,古德明 GU Deming 可能是吉德明 JI Deming 之误。樊国樑 FAN Guoliang《燕京开教略》Yanjing kaijiao lue 载辅仁大学 Furen daxue 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编《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Zhongguo Tianzhujiao shiji huibian, (辅仁大学出版社 Furen daxue chubanshe 2003年)(1905年初版,救世堂印行)。古伯察 GU Bocha《鞑靼西藏旅行记》Dadan Xizang luxing ji, 有耿昇 GENG Sheng 汉译本, (中国藏学出版社 Zhongguo zangxue chubanshe, 1991年)。

〔10〕 拉米奥 LA Miao, 1797年(嘉庆 Jiaqing 二年)抵京, 1831年(道光 Daoguang 十一年)卒。

〔11〕 [法]古伯察 GU Bocha 著、耿昇 GENG Sheng 译:《鞑靼西藏旅行记》Dadan Xizang luxing ji, (北京 Beijing: 中国藏学出版社 Zhongguo zangxue chubanshe, 1991年), 第26页附录。

后晋铎。南弥德神被逐时,指派薛玛窦继任其会长之职,管理北京、直隶、河南、蒙古等地教务。教会史料载:“彼时圣教犯禁,神父常昼伏夜行,潜藏传教。……一二中国神父潜踪传教,照管北京教友,仅延一线之传。”^[12]

薛玛窦任西湾子本堂,同时掌管北京北堂所属地区教务,此时北堂共有薛玛窦、韩若瑟、林味增爵,高多默,宋保禄五位神父和李味增爵修士。薛玛窦初来西湾子时,全村有教民300多,经过六年努力教务不断扩大,本地新旧教徒和他处迁来教徒总计676人。^[13]薛玛窦在“圣教窘境”、西籍神父虚位期间,潜身传教,主持教务,发展教徒,使天主教得以“一线延续”。孟振生对这位国籍神父评价甚高,并为其作传——《薛玛窦神父》。^[14]

1840年底,罗马教廷将刚刚划分不久的满洲、辽东、蒙古教区重新划分,从中分出一个新的教区——蒙古教区,并任命孟振生神父为新教区代牧。当时蒙古教区的界限是:南以长城为界,东以关东三省为界。教区总堂设在西湾子。

孟振生为蒙古教区第一任主教,日后又擢升为北京教区代牧,他也被教内人士认为是“十九世纪时远东传教士中最有功劳、最有名望的一位”。^[15]1841年8月,当教廷谕令传至西湾子,教士教民无不欢呼雀跃,庆祝孟振生担任主教,庆贺西湾子从一个小小的山村变成了一个独立教区的总堂。1842年,孟振生接受委任令,前往山西,当地的金主教(Mgr. Salvetti)于7月25日在红沟子祝圣孟振生神父为主教。

1848年之后,孟振生返回北京教区主持教务。孟振生自西湾子返回北京一直到去世,其主要传教活动在北京,期间他重修四堂(即北京南、北、东、西四堂),恢复“圣教”。史料云孟振生返回北京后“乃又公然传教,重修四堂,圣教又复昌明”。^[16]还曾返回欧洲并举行讲演活动。1861年孟振生在布鲁塞尔期间,与后来创办“圣母圣心会”的比利时人南怀仁相识,次年南怀仁与孟振生在巴黎再次相见,两次会晤中二人谈及的问题就是到蒙古传教之事。^[17]三年后,南怀仁带领圣母圣心会会士到内蒙地区传教,开始了内蒙古天主教传播史上的圣母圣心会时期。

1846年4月,罗马教宗委派孟振生管理北京教区,同时兼任蒙古教区代牧。于是孟振生遴选孔神父(Fr. Florent Daguin C. M.,又译为达京)为蒙古教区副主教负责教区具体教务,并于1848年7月25日在西湾子为其举行祝圣大典。孔神父在蒙古教区担任副主教十年后,1857年9月19日被任命为正主教。1859年5月9日,孔主教病逝于苦立图。

在孔主教执掌蒙古教权期间,还有梁儒望神父(Jean-Victor Gottlicher, C. M.)、廉神父(Francois-Joseph Williaume, C. M.)、龚神父、戴济世神父(Mgr. Francois-Ferdinand Tagliabue, C. M.)以及白振铎神父(Bray Géraud C. M.)等在西湾子传教。中国籍神父则有郑保禄、赵玛弟亚、吴味增爵、樊味增爵等神父。蒙古喇嘛凤伯多禄于1854年晋铎为神父,也在本区传教。戴济世神父在1859年5月孔主教病逝后接替其职,为蒙古教区副主教,代理本区教务。

[12] 萧静山 XIAO Jingshan:《天主教传行中国考》Tianzhujiao chuanxing zhongguo kao,辅仁大学 Furen daxue 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Zhongguo Tianzhujiao shiji huibian,(台北 Taibei:辅仁大学出版社 Furen daxue chubanshe,2003年),第240页。

[13] [比利时]隆德里 Longdeli:“西湾子圣教源流 Xiwanzi shengjiao yuanliu”,载古伟瀛 GU Weiyong 主编:《塞外传教史》Saiwai chuanjiao shi,(台北 Taibei:台北光启文化事业出版社 Taibei Guangqi wenhua shiye chubanshe,2002年),第15-19页。

[14] [法]孟振生 MENG Zhensheng:“薛玛窦神父 Xue Madou shenfu”,载古伟瀛 GU Weiyong 主编:《塞外传教史》Saiwai chuanjiao shi,(台北 Taibei:台北光启文化事业出版社 Taibei Guangqi wenhua shiye chubanshe,2002年)。

[15] [比利时]隆德里 Longdeli:“西湾子圣教源流 Xiwanzi shengjiao yuanliu”,载古伟瀛 GU Weiyong 主编:《塞外传教史》Saiwai chuanjiao shi,(台北 Taibei:台北光启文化事业出版社 Taibei Guangqi wenhua shiye chubanshe,2002年),第20页。

[16] 萧静山 XIAO Jingshan:“天主教传行中国考 Tianzhujiao chuanxing zhongguo kao”,辅仁大学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Zhongguo tianzhujiao shiji huibian,(台北 Taibei:辅仁大学出版社 Furen daxue chubanshe,2003年),第240页。

[17] [比利时]Daniel Verhelst:“向中国传教的比利时 Xiang zhongguo chuanjiao de Bilisi”,载古伟瀛 GU Weiyong 主编:《塞外传教史》Saiwai chuanjiao shi,(台北 Taibei:台北光启文化事业出版社 Taibei Guangqi wenhua shiye chubanshe,2002年),第131页。

经过孟振生主教、孔主教的努力经营,遣使会在内蒙古的传教范围也进一步拓展,形成了以下三个中心:中为西湾子,西为小东沟,东为苦立图。遣使会时期形成的三个中心,成为后来蒙古三大教区的雏形。

天主教以内蒙古中部西湾子为传播之“源”,由此向西发展,则到了小东沟和归化城等西部地带。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孟振生将西湾子大小修道院分开,把小修道院迁到大青山小东沟村,于是小东沟成了向归化城和西部蒙古传教的大堂口。同年,西湾子总堂秦噶啞神父,来到归化城,“试行劝化那些喇嘛们进教”;而法国遣使会士古伯察(Regis-Evariste Huc, C. M.)也“心怀劝化蒙藏人民信教的大志”,同秦司铎在归化城进行传教活动。小东沟小修道院建成,相继有柯神父、翁神父(Joseph-Laurent Carayon, C. M. 又译作翁羊铎)任院长。吴味增爵修士,任拉丁文教师。两年后小修道院又搬回西湾子,但小东沟村作为一个主要堂口却保留下来。

孔主教和第一位晋铎的蒙古族神父凤伯多禄则致力于蒙古东部苦立图等地布教。遣使会士以西湾子为中心,向东发展,很快延伸到内蒙古东部地区。当时东部地区的教务中心是苦立图,又作苦柳图、苦力吐、库里图,在今赤峰市翁牛特旗境内。是赤峰教区最早的教堂。

在古伯察于此传教前后,黑水川又向北部的巴林旗草地派出千名教徒垦殖,并建立了以大营子为中心的天主教会。“数年以来,巴林旗的王爷将其地盘向汉人开放,他们的人数在那里变得如此之多,以至于应开设一个新的县——林西县。”^[18]

蒙古教区第二任主教孔神父也亲临苦立图传教多年。孔主教1843年来蒙古地区传教,1847年任孟振生在蒙古教区的副主教,十年后被任命为主教。孔主教经常到教区各处巡视。1859年5月孔主教病逝于苦立图。孔主教的墓碑现存于该堂,墓碑上的西文翻译如下:“为纪念极可敬的蒙古传教区宗座代牧孔主教遣使会士,一八一五年生于法国,一八四〇年到中国,三年后至西湾子,由孟默理主教(即孟振生——引者注)祝圣为已副主教(为已助手),一八五七年继其位,一八五九年逝世于苦立吐。”^[19]

以苦立图教堂为中心,附近建有马架子教堂。乾隆年间,有张姓家族自山西前来定居于东山的马架子村。他们以经营木材为生,还在那里开商行。其雇员白氏,因与北京的基督徒赵氏家族的交往而归化,后张氏家族也受其影响而皈化。白氏、张氏家族中都在府中设立小教堂,供基督徒们举行宗教活动之用。咸丰年间(1851—1861),集资建有马架子公所。当时在朝阳一带,也早有教士活动,松树嘴子在1857年(咸丰七年)已建有教堂。遣使会秦噶啞神父、古伯察神父都曾在此传教。古伯察横穿中国之游即始于此处。而马架子教堂的正式建立,则是在1883年东蒙古教区成立后,由松树嘴子教区比利时籍吕主教决定,在马架子公所基础上建立而成。至此,遣使会逐渐在蒙古东部地区立足。

结 语

遣使会前后80年的传教过程,正是天主教在塞外确立根基的时期。为塞外传教事业贡献杰出的天主教士主要有秦噶啞神父、孟振生主教、古伯察神父、孔神父、凤神父等。特别是遣使会西湾子、苦立图、小东沟三个传教中心的形成,表明19世纪六十年代,在内蒙古东部、中部和西部广大地区,已经到处都有西方传教士特别是法国遣使会传教士活动的足迹,为后来的比利时圣母圣心会在蒙古地区传教奠定了基础。

[18] [法]古伯察 GU Bocha 著、耿昇 GENG Sheng 译:《鞑鞑西藏旅行记》*Dadan Xizang lüxing jì*, (北京 Beijing: 中国藏学出版社 Zhongguo zangxue chubanshe, 1991年),第30页附录。

[19] 冯允中 FENG Yunzhong: “天主教赤峰教区沿革 Tianzhujiao Chifeng jiaoku yange”, 载《赤峰市文史资料选辑》*Chifeng shi wenhua ziliao xuanji*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赤峰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 1984年。

English Title:

Congregation of the Mission with the Formation of Three Missionary Centers in Mongolia (或 Beyond the Great Wall 塞外)

BAO Guizhen

female, Mongolia, Ph. D. , Professor, 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us Study, Zhongguancun Nan Dajie No. 27, 10081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P. R. China. Tel: +86-136-9362-8575. Email: qqg1231@163.com

Abstract: Congregation of the Mission (C. M.) was one of the four major Catholic groups who did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It connected the Jesuit and Sacred Heart of Mary, preached to Mongolians, created three missionary centers in the Mongolian area and laid the foundati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ree major Dioceses in Mongolia.

Key Words: Catholic, Congregation of the Mission (C. M.), Struggle of Rites, Missionary Center